

在追求理想目标的过程中，他们历经数十年的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国共内战，最后病魔缠身给压垮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仅为了追述他们及那一代人的命运，也为了纪念他们的成就、创造力、仁慈，以及支撑他们勇气的幽默感。——费慰梅

在费慰梅笔下那些动人而亲切的生活片段里，我们更加感受到，他俩情笃而慌乱的婚姻、生活中迸发的生命之光。我们仿佛听见，他们高朋满座的客厅里，酒杯见底，笑声连珠，浮沉着杯盘碰撞。我们仿佛看见，他们细心研究恢复古建筑典籍的本来面目，他们灵巧的手指驾驭那管笔穿梭于技术细节之间，中英文一样典雅。我们还看到，已经消失的古建筑终于在民族意识中重新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我们也感受到，他们在漫长疾病苦痛中，从未放弃的幽默与刚毅。——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



费慰梅
成寒

著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中国建筑之魂

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费慰梅
成寒



中国建筑之魂

(沪权)图字: 09-2003-29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慰梅 著
成寒 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10

ISBN 7-5321-2582-3

I.中… II.①费… ②成… III.①梁思成(1901~1972)-传记②林
徽因(1904~1955)-传记 IV.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1550 号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责任编辑:谢 锦

封面设计:周艳梅

中国建筑之魂

——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费慰梅 著 成寒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83,000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100 册

ISBN 7-5321-2582-3/K·184 定价:2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4742915

目录



代序 / 1

作者前记 / 6

第一部 启蒙时期，1901 年—1928 年

1. 梁家长子 / 10

2. 林家掌上明珠 / 18

3. 岁寒三友图 / 25

4. 遨游建筑天地间 / 35

5. 留学归来 / 47

第二部 多方面的成就，1928 年—1937 年

6. 东北大学开天辟地 / 58

7. 徐志摩之爱与死 / 62

8. 建筑史学家 / 68

9. 寻找古建筑 / 74

10. 太太的客厅 / 82

11. 应州塔、赵州桥 / 90

12. 骑驴走马过山西 / 102

13. 日本的入侵 / 115

14. 暂时喘一口气 / 121

15. 发现佛光寺 / 128

第三部 历经抗战，1937 年—1945 年

16. 逃难 / 137

目 录



17. 暂居昆明/142

18. 行行复行行/153

19. 陪都重庆/162

20. 李庄的日子/167

21. 第一部中国建筑史/172

第四部 战争与革命之间, 1945年—1949年

22. 八年抗战结束/176

23. 重返昆明和北京/184

24. 一九四七年的荣耀/190

25. 那段担惊受怕的日子/199

26. 最后的一封信/204

第五部 在共产党政权下, 1949年—1972年

27. 失望与挫折/212

28. 林洙的诉说/222

作者后记/238

译者后记/244

主要参考书目/248

笑靥如花，任她娇枝凋零

倘若我们从远处俯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便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惊人虚掷的世纪：虚掷了机会，虚掷了资源，也虚掷了生命。外敌侵占的苦痛，更加上国内政治的恶化，怎么可能产生有序的国家建设？个人的创造力、知识的探索，又怎么可能广泛流行？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故事，从一开始似乎就印证了上述的悲观省思。千重万叠的社会浪费，打乱并吞噬了他们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地，这个世界就是不留给他们任何呼吸的空间。然而，在费慰梅笔下，那些动人而亲切的生活片断里，我们更加感受到，他俩情笃而紧张的婚姻生活中迸发出的生命之光。我们仿佛听见，他们高朋满座的客厅里，杯底喝尽，连珠的笑声上浮沉着杯盘碰撞响。我们仿佛看见，他们细心研究恢复古建筑典籍的本来面目，他们灵巧的手指驾驭那支笔穿梭于技术细节之间，中英文一样典雅。我们还看到，已经消失的中国古建筑终于在民族意识中重新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我们也感受到，他们在漫长病疾苦痛中，从未放弃的幽默和刚毅。

梁思成与林徽因两人都降生在二十世纪初期传统与现代冲突、地位摇摆不定的中国。林徽因的父亲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梦想家和好奇探索者。因原配无出，他讨了两房姨太太。林徽因就是大姨太太的独生女，受过非正规但良好的教育。一九二〇年，她父亲任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英代表，他带了十六岁的徽因就



任，给他做伴、当女主人。但是，当诗人徐志摩热烈地爱上她后，父亲就把她带回中国，让她再度与梁思成同处。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徽因早已许配给他。

梁思成一九〇一年出生在东京，当时他父亲正受没落清朝的追捕，被迫流亡日本。一九一二年清朝垮台后，梁启超一家回到中国。在民国初期的动荡年代，梁启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知识才华和政治热情。思成进入清华学堂，同时在国学方面又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诲，梁启超还要求他把威尔斯（H.G. Wells）的《世界史纲》（Outline of History）翻译成中文。一九二三年发生了一件意外，他骑那辆崭新的戴维逊（Harley Davidson）摩托车时不幸出了车祸，由于治疗不当，思成的腿从此有点跛，必须穿上钢架走动。徐志摩这时已经回国，且成为一位颇有影响力的诗人，而徽因也正式和思成订了婚，但仍和徐志摩保持了过去的友谊。他们一起安排了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在北京举办小提琴演奏会，为印度诗哲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在中国的巡回演讲担任翻译。

在梁启超的敦促下，徽因和思成双双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他们俩虽已订婚，但在学位到手之前不准结婚。在二十年代费城的布杂艺术（Beaux-Arts）学派的气氛里，思成念建筑，徽因学美术，套句梁启超说的话，他俩“修

行”了一段时期，在情感上和身心上都历经磨练。虽说不上修炼到完美的地步，但确实加深了两人的感情。一九二八年他俩终于在加拿大完婚，在修完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国，成为新成立的沈阳东北大学建筑系最早上任的两位教授。

一九三二年，徽因和思成因日军侵略沈阳而被迫离开学校，返回北京。新婚不久的慰梅和正清在一个聚会中认识了他们，徽因已有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并知道自己患了结核病。徐志摩一直是他们家的客人，不幸在一次坠机事件中丧生。梁启超也因肾脏手术失败，不幸去世。这时思成借助紫禁城老工匠的指引，开始投入中国古代建筑典籍的研究。在这个纷乱、忙碌而又沸腾的时期，梁思成夫妇，偶或在费正清夫妇的陪伴下，开始对中国现存最早期的建筑进行一连串的实地考察。他们最大的成就是确认、测量、绘制并拍摄了山西五台山里一座建于公元八五七年的木结构寺庙——佛光寺。但，这仅是《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里的众多惊人发现之一。这本书写的过程历经了许多年，其中又停顿无数次，终于经费慰梅亲手将已散佚的图文编成完整的一本书。

尽管在三十年代后期，费梁两家在命运的摆布下，天各一方，但思成和徽因、慰梅和正清的友谊仍凭借书信维系不断。费慰梅记忆中最难忘的是徽因的声音。我们谛听到徽因的呻吟、操



劳、新的痛苦，以及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导致的颠沛流离，梁氏夫妇先到长沙，辗转又奔西南的昆明、重庆。对徽因而言，这不但是一个世界的崩溃与惊骇，更是那种“空寂的小庙，娇枝嫩叶在凋零，靠着浪漫的自尊依稀去跨越那朦胧的桥身 (delicate bare branches that scatter silver, small quiet temples, and the occasional bridge one can cross with romantic pride, 见第十四章)”，在肺病的剧烈咳嗽和寒夜陋室里的颤抖中，徽因依然能够写下“太阳从那奇诡的方位带来静穆而优美的快感 (the sun steals in curious angles into one's aching sense of awareness of quietness and beauty, 见第十七章。译注：这两句皆出自林徽因致费慰梅的信，原是英文)”的句子。

战争的最后一年，这两对夫妇曾经在重庆短暂相逢，但从此就再也没有团聚过。国内战争、韩战、冷战一连串发生，接着是死亡（一九五五年徽因、一九七二年思成、一九九一年正清）为他们的今生之缘画上了句号。然而，梁思成与林徽因仍继续不断为他们所追求、所热爱的建筑尽一切的努力——保存北京的绿化，防止北京遭受工业化的侵害，将城墙和城门改造为公园，让子子孙孙得以享受这一奇迹。然而他们失败了，他们被批斗、被折磨、被羞辱，而在死后，当一切都已为时太晚时，他们又被赞扬，被认可。

我们记得的当然是我们想记的，而不是只要发生了就会记得住。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些过去全搁在心里头。那是梁思成在“文化大革命”中噩梦般的情景，他的脖子上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的黑牌，木然地，面对周遭的讥笑，脸庞笼罩着一层“无尽的羞辱”。但我要感谢费慰梅，对我来说，那些情景都被另一幅画面所取代：我看到小思成在日本海边偷潜下水，伸出小手想去揪自以为是的哲学家康有为的胡须，以及思成那些严谨、优美的图画和书法。我还看到，不是在一九五五年寒冷的北京死于肺结核，来不及看到最后一堵庞大的古城墙轰然倒塌的徽因，而是在一九三二年北京家中，孩子和友朋的笑闹声在客厅里回响着，徽因粲笑如花，书桌上放着未完的诗稿，脑海里却跳动着在未来几个月中前往未知的古老庙宇考察的计划。我还看到，思成和徽因一块儿乘火车、坐卡车，甚至搭驴车碾过人迹罕至的泥泞小径，直到爬上了中国历史的梁架之间，手指沿精巧的木工细纹抚摩过去，赞叹那已经永远失落了的艺术内涵与精致。

史景迁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八日 耶鲁大学



作者前记

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毕生都以哈佛大学为根据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别人常说他“在二次大战后的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现代中国研究的领域。”(美国哲学学会议事录 137, 2 (1993 年 6 月): 282)

一九三二年他在北京和我结婚的时候，我已经和他有了共同的爱好。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研究生，他来自南达科他 (South Dakota)，我则来自麻州剑桥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译注：哈佛大学所在地)——我们相遇相恋的地方。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中国艺术，他则喜欢从各层面研究中国历史。

我们在北京东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住下，找了中文老师，就开始学习语言。一有空，我们去紫禁城皇宫和香山佛寺探险，这些都是著名胜地，但是更吸引我们的是当时环绕着北京的高耸的城墙和门楼。墙内，那永不落幕的生活戏剧就在大街上演着。尽管我们在探险中充满了愉悦，但充其量不过是看得眼花缭乱的旁观者罢了。

约莫在我们婚礼后的两个月，我们遇见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我们都不曾想过这段友谊日后会持续那么多年，但一开始彼此就互相吸引住了。他们很年轻，彼此深爱对方，同时又很乐意我们常找他们做伴。徽 (Whei)——她特为外国密友取的昵名——人长得美，个性又活泼。思成则比较内敛些。他彬彬有礼，十分聪

敏，偶尔还展现古怪的机智。他俩都会说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文化。徽以她的健谈和开朗的笑声来平衡丈夫的拘谨。谈话间，各自提到美国大学生活趣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学读研究所时来到北京。这又让她讲起自己在伦敦一年中学生活的点点滴滴。

我们离去时，她向我们要了地址。这时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们两家的房子离得很近，他们就在大街的尽头东城墙下。他们和我们一样年轻，又住得那么近，真让我们喜出望外。

从那时开始，两家的友谊与日俱增。我们不久就知道思成曾在宾州大学攻读西方建筑学，目前已开始了身为中国第一位建筑史学家的研究工作，日后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肯定。徽是他在建筑学方面的助手，但她至今仍令人怀念的原因，则在于她毕生所写的许多诗篇。

思成和徽皆系出名门，有名声显赫的父亲。因为他们和他们朋友的关系，许多领域都为我们敞开了大门。我们已不再是旁观者。隔年，费正清开始在清华大学授课，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是这里的一分子了。

随着本书的展开，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我们四人多年来维持的亲密友谊。我们比他们多活些年原本不足为奇，因为在追求理想目标的过程中，他们历经数十年的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国共内



战，最后病魔缠身给压垮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仅为了追述他们及其他人的命运，而且也为了纪念他们的成就、创造力、仁慈，以及支撑他们勇气的幽默感。



第壹部

启蒙时期

1901—1928



梁家长子

梁思成的一生受他父亲梁启超的影响很大。父亲的卓越、理想以及对儿子的关怀塑造了梁思成。儿子对父亲尽孝道是每一个中国男人的基本美德，然而对梁思成而言，他还有特殊的理由——他父亲是梁启超，一八九八年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当时，出人意料地，日本竟在一八九五年打败了中国，而一八九八年初，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就在那一年夏天，梁启超加入他的老师康有为的阵营，支持年轻的光绪皇帝颁行新政，提出“戊戌变法”以拯救中国。当维新运动因保守派政变而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到了日本。当时他还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广东青年，一个早熟的学者和活动分子，以其掷地有声的著作成为出类拔萃的精神领袖。

唯有儒家学者才能担当起使中国思想现代化的重任，而这种改革只能从儒家内部开始。梁启超在日本出版一系列的中文刊物，将西方学说介绍给革命世代的中国儒家学者。这使他具备了改革家的资格。

不及二十岁，梁启超就与贵州女子李蕙仙结了婚，她比他大四岁。这桩婚姻是由她的兄长安排的。他是一位考官，在举人考试中，看到梁启超表现优异而相中了他。至于李蕙仙本人，外界则所知不多，仅知她是个平凡的妇人。她的脚当然是缠过的，她的思想也同样受到束缚。尽管和一位以探索和开拓宽广世界为己任的丈夫共同生活，她仍满足于恪守自己的传统。一八九三年她在广东生下头一胎孩子——女儿思顺。五年后她带着孩子到日

本，和流亡中的丈夫团聚。

历经动荡的岁月，梁启超在日本的生活可说是相当的平静。女儿是掌上明珠，但眼前迫切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继承香火的儿子。太太很快又怀孕了，生下盼望已久的男孩，可惜生下来不久就夭折。当时她已经三十来岁，只给这个家添了一个六岁的女儿。她是个识大体的妇人，知道自己无法履行生子息、传香火的责任，于是特地回贵州老家一趟，挑了个可以为夫家传宗接代的小老婆，带着这个二太太一起回日本。这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健康又活泼，可是不识字也没有缠过小脚，小小年纪就被主人买去，养在家里当丫头使唤。她应该能够生养健康的孩子，又能明白她在梁家低贱的地位及侍候梁家人的义务。

然而，最后还是原配夫人生了一个男孩继承香火。梁思成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日在东京出生，他活了下来，并挑起身为长子的责任，这份责任，在未来数十年的艰苦岁月中他一直挑着不放。三年后，二太太也生了个儿子思永。男孩们是彼此的童年玩伴，青年时期的好友。长大以后，他们都成为著名的学者。

原配夫人生了二女儿思庄以后就不再生育。二太太却不断怀孩子，直到一九二九年梁启超去世，不久他的第九个儿子也在出生后夭折。多年来，梁启超创作力旺盛，写出的著作深具影响力，可他的生命却在五十六岁那年提早结束了。他一共有十四个孩子，每个孩子长大以后都成为有用的公民，其中几个成就斐然。

二太太又比原配夫人多活了许多年。终其一生，她是梁家的支柱，家人无论是生病或健康的时候都受到她的照顾，而孩子们也以尊敬和爱戴来回报她。她来到这个学者家庭时还是个文盲，一直等到第一个孩子上了学，她也跟着一起学习。她学会了读书，而且读得朗朗有声，表情丰富。她不仅擅长护理和料理家庭，而且学会了游泳、溜冰、滚铁环、编织、钩毛线、打桥牌和麻将，



还学会了针灸。

对梁启超来说，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二年流亡日本的岁月可以说是多彩多姿。他继续写作、编书及发表他的政治见解；他学会日文，能阅读西方书籍的日文译本；他四处旅行，到过夏威夷、新加坡、澳洲、加拿大及美国访问华侨。在思成的记忆里，那些年是一个和乐家庭的日常生活写照，每天和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一块儿玩耍，照顾他们起居的是日本仆人，而他们上的是华侨学校。从一九六四年他为日本一家刊物写的文章片段，可以看出当时的情景：



梁启超与思顺、思成、思永合影于东京，约1905年。

我自横滨（Yokohama）时期开始晓事。父亲当时在编一份知识分子刊物《新民丛报》，印刷厂的二楼就是我们的家。我每天到华侨办的大同学校附属幼儿园去，教师全是日本女人，她们都很慈祥温柔，像妈妈和姊姊一样。

日本地震多。每次地震发生的时候，日本阿姨就抱我下楼，因为母亲是缠过脚的，下楼不太方便。

差不多在我六岁那年，我们搬到了须磨（Suma），住的是一栋华侨拥有的别墅，有座大花园，连着一片直往海滨的松林。父亲称这地方“双涛园”，因为听得见海涛声和松林间的风声回荡。

堂哥堂姊们和我一块儿从家里步行到通往神户（Kobe）的火